

# 方块白文与汉字俗字

王 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方块白文的书写符号系统与汉字俗字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白文自造字的书写符号实际上是由汉字俗字借用而来的。此外,有一部分白文自造字则是在字形上与汉字俗字偶合。汉字俗字对白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白文直接借用汉字俗字;二是白文造字法受到汉字俗字的影响。

[关键词] 方块白文;汉字俗字;书写符号系统;造字法

[中图分类号] H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345(2009)09-0059-05

## On the Old Bai Scrip and Chinese Variant Characters

Wang F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riting symbol system of the old Bai scrip and Chinese Variant characters. Some Written symbols of the old Bai scrip in fact borrowed from Chinese Variant characters. In addition, the method of creating characters of the old Bai scrip was affected by Chinese variant characters.

[Key words] old Bai scrip; Chinese variant characters; the writing symbol system; the method of creating characters

方块白文又称白文、𐵓文,是白族在历史上仿照汉字创制的一种民族文字。白文是以汉字为基础,以汉字假借字和汉字仿造字为主,由多种造字方法构成的复合型的书写符号体系。在白文书写符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汉字俗字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所谓的汉字“俗字”,是指区别于汉字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广义的汉字“俗字”,包括所有不符合汉字通用规范的文字现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某地区或某社会群体自造的不能归入规范汉字系统中的俗字,如一些汉语方言区流行的“方言字”;二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不规范的汉字书写形式,如相

对于正体(楷体)的草书、行书等俗体;三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与通用汉字在字形结构上有所不同的俗体字(一般也称“异体字”)<sup>[1]</sup>。其中,第三类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近20年来,以张涌泉为代表的汉字学界对于俗字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给白文等汉字系文字以很大的启发。

### 1 白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汉字俗字

在白文的书写符号体系中,汉字俗字有着重要的地位。前人早已注意到汉字俗字“囿”在白族地区长期的使用及流变。但白文中的很多俗字,此前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往往被误认为所谓的“白字”,即自造字。因此,对这些字进行“正本清源”,对

[收稿日期] 2009-06-09

[作者简介] 王锋(1971-),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于正确认识白文的书写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经过初步的梳理,可以确认白文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字俗字。

1.1 囡 “囡”是“國”的俗字。“國”的古体、俗体很多,如“囡”、“囡”、“囡”、“囡”、“囡”、“囡”等。其中“囡”字的影响较大。据顾野王《玉篇》记载:“囡,故國字,唐武后所作。”武则天在位时,认为“國中或者惑也”,遂改“國”为“囡”。武则天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退位,“囡”字随即被废,使用时间不长。而“囡”字在唐代传入云南后,被南诏、大理国两个地方民族政权沿用近500年,在后代的白文中也经常使用,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原地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各种文献,包括碑刻、题记、绘画、手写佛经等文献中,“囡”字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一直沿用到元明时期。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囡字者。囡,武后所作國字也。”相关的文献,如大理国时期的白文碑刻《大理囡释氏戒净口绘高兴兰若篆烛碑》、南诏大理国手写白文佛经中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宋代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中的题记“建囡观世音菩萨”、“十六大囡王众”、“护囡正(宝)幢”等,都充分说明了“囡”字在南诏大理国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中的广泛应用。

“囡”字的应用在白族民间也很普及,如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沙登村第十六号窟第二龛佛座下的刻字题记”如下:“沙追附尚邑三睽白张傍龙、妻盛梦如、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安、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仏(佛),囡王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七月二十五日题记。”据杨应新等考证,建造佛像以及题记撰写者都为当地沙溪村一带的白族,该题记就是讲述建造佛像缘由的白文<sup>[2]</sup>。

关于“囡”字的使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有所不同。南诏时期,不分中原外邦,一律都用“囡”字;到大理国时,则有“囡”、“國”之分,“囡”专指大理国,凡是“大理囡”、“高相囡”、“囡师”等,一律用“囡”;而“中國”、“國议大夫”等,则用“國”,界限分明,绝不相混。这充分说明,随着内地“囡”字被废,“國”字占了统治地位,而“囡”字在大理则已经发展成为特

指大理国的专用字了。

中原地区尽管“囡”字在唐代以后很少使用,但其性质唐宋以来早已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在有关白文的研究中,对这个汉字俗字的认识也比较统一。

1.2 惡 “惡”的俗字。敦煌写本伯2553《王昭君变文》:“愛之欲求生,惡之欲求死。”按《干禄字书》:“惡惡,上俗下正。”《颜氏家训·书证篇》记录当时俗书“惡上安西”,就是指“惡”字。“惡”作为“惡”的俗字,其形成可能是书写原因。民间往往对一些形体复杂、书写不便的汉字进行简化,这些简化字构成了汉字俗字的主体。建国后进行汉字简化,很多就直接采用了这些俗字。“惡”字上半部分曲来拐去,十分难写,俗字节省笔划写成“惡”,大大简化了结构,书写也简便多了。“惡”俗字又作“惡”,如《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你見他貌惡,當初我也如此,後來慣熟,方才好過。”<sup>[3]70-71</sup>从笔划结构上看,“惡”也要比“惡”简便得多。明代白族文学家杨黼所著的著名白文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第15段:“行仁義禮上不輕,亮惡弊逆上不重,三教經書皆推習,漕(右边声符为‘害’)溪水一嘯。”

1.3 仏 “佛”的俗字。敦煌写本中“佛”字多写作“仏”,数量众多,随处可见。又《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北周《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願一切法界眾生,早得做仏。”同书卷二四隋《白佛山造象题名·王敬伯等题名》:“象主朱遮羅,妻孫迎,南君玉,居眷侍仏時。”这里的“仏”都是“佛”字。《改併四声篇海·人部》引《川篇》:“仏,西域聖人,有六通也。”清代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二唐《幽栖寺尼正觉浮图铭》跋:“文不甚工,字帶隸體,云‘入仏法海’者,即‘佛’字。”“佛”作“仏”,应是符号代替形成的俗字,如日本汉字“佛”作“仏”,“拂”作“払”,其中的“仏”,也同样是形体代替的简化符号<sup>[3]71</sup>。可见“佛”写作“仏”,是唐宋以来较为普遍的简化方法。如“惡”的上半部分一样,“佛”字结构复杂,较难书写,写作“仏”以后,书写大为简便。《正字通》认为“仏”是“佛”的古字,并不确切。

1956年,费孝通等先生在大理凤仪发现两批佛经共三千多册。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

共20卷。这20卷佛经中夹杂着白文,有的在汉文经卷右侧有白文旁注,卷尾有白文注疏。这批经卷年代较早,其价值令人瞩目。手写佛经白文旁注和白文注疏中的大量“佛”字,都写作“仏”。且书写流畅,前后统一。又如上文所举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沙登村第十六号窟第二龛佛座下的刻字题记”中,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仏”字样,充分说明当时“仏”字在白族民间也有广泛应用。

另外,“佛”又有俗字为“伏”。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观音生日》:“飽看仙花,遍聞伏號”。“伏”字从天人,当是“佛”的会意俗字。此字白文中未借用。

1.4 竟 “覺”的俗字。该俗字在敦煌写本中广为使用。“文”和上文的“亼”一样,也是一个简化和省略的符号。类似的字在敦煌写本中经常出现,如“學”俗作“孖”,“齊”俗作“𠂔”,“齋”俗作“𦉳”。此外类似的还有“舉”写作“𦉳”(见《清平山堂话本》)、“譽”俗作“𦉳”(见《京本通俗小说》)等。很显然,其中的“文”都为简省符号。清代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南宋《何友直题名》跋:“題曰‘……臨行不竟黯然而……’覺字作‘竟’蓋省筆,‘文’又‘爻’之訛也。”他认为“竟”是一个由省笔而成的讹字,并不准确<sup>[3]71-72</sup>。

明代白族文学家杨黼所著的著名白文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方丈(‘丈’字右下角加點)丘燒三戒香,竟苑中點五更燭,雲窓下拈大乘經,看公案語錄。”其中的“竟苑”就是“覺苑”。与“竟”这一个字类似,白文中常将“學”写作“孖”,“舉”写作“𦉳”,在此不再一一讨论。

1.5 井 “菩薩”的合文。敦煌写本伯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若非井之潛形,即是輪王之應位。”按《龙龕手鏡·草部》:“井,莫朗反,草木冬生不死也。又音菩薩二字。”<sup>[3]105-106</sup>莫朗反即莽字,而“音菩薩”即指“井”是“菩薩”的合文。“菩薩”在敦煌写卷中作合文,可能是因为该词是佛典中的常用词,出现频率极高,抄写者为了节省时间,开始有意无意地用“菩薩”二字所从的草字头来代替“菩薩”二字,后来使用久了,便把两个草字头合在一起,写成为“井”。白文中的“井”,主要出现在南诏大

理国手写佛经中。在白文中,其音义都没有太大改变。

1.6 廿 为“二十”的合文。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云:“今人書二十字為廿……廿音入,二十並也。”唐代以前“廿”仍读为二字二音,之后逐渐读为一字一音。今本《玉篇》中已出现“廿”读如拾切的音切,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其读为一字一音了。白文古籍,尤其是民间白文文献,经常使用“廿”字。“廿”字显然也是直接借用了汉字俗字。不过“廿”字的借用和前述的俗字不同。它是一个借音字,也就是只借用了字音,而没有借用意义,常用来标志白语中“也”(读音为li<sup>55</sup>)及“和,与”(读音为ni<sup>55</sup>)的意义,因此,按白文中假借汉字的方法分类,可知前者是借词字,而后者是借音字。

## 2 字形相同但并非汉字俗字的“白字”

有的白文虽然与汉字俗字字形相同,但并非借用自汉字俗字,而是白文自造字。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其读音、意义均与汉字俗体完全不同,读写方法完全遵循白文造字的内在规律,因此可以肯定这是白文将汉字偏旁重新组合后造成的新字。其字形与汉字俗字相同很可能只是偶然现象。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字在形体上受到汉字俗字的影响,如:

2.1 噉 汉字俗字有“噉”字。有两义,一同“啖”,如《广韵·敢韵》:“噉,噉食。或作啖。”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其噉字。俗多不定。……索前史及諸家並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一为“喊”的俗字。敦煌写本中“噉”字较常见,多用作“喊”的俗字。伯3697《捉季布传文》:“遙望漢王招手罵,高聲直噉呼劉季。”“噉”又作“噉”,为形旁替换字<sup>[3]97-98</sup>。

但白文中的同形“噉”字显然在音义上都与这两种俗字不同。白文的“噉”字读为ka<sup>31</sup>,意为“讲”。从造字方法来说,白文的“噉”字是以“口”为意符,以汉字“敢”为声符的形声字。“噉”字在白族民间白文作品中较为常见,属于很典型的白文形声字。

2.2 𠂔 汉字俗字中有“𠂔”字。《篇海》引《类篇》莫浪切。《字汇补·口部》:“𠂔,问而不答也。”张涌泉认

为“𠂔”当是“𠂔”的讹俗字。《方言》卷一〇：“沅、澧之間，凡相問而不知，答曰諛；使之而不肯，答曰𠂔。”郭璞注：“音茫，今中國語亦然。”“𠂔”先由上下结构变作左右结构，再讹作“𠂔”〔4〕300。

白文的“𠂔”是使用范围较广，在各地白文文献中也较为统一的一个“白字”。它在字形上虽然和汉字俗字“𠂔”完全相同，但在音义上完全不同。白文的“𠂔”读音为nɔ<sup>44</sup>，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上，上边”，另一个是作为结构助词，意为“的”。如白文曲本《柳荫记》“干哦哥𠂔苦情双”（意为“述说哥哥的苦情”）中的“𠂔”字，就是结构助词“的”。“𠂔”字的这两个意义非常常见，因此“𠂔”字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在各地白文文献中都普遍使用，形、音、义也高度一致，是白文中少数几个广泛通用的白文自造字。其造字方法是在表示意义的“上”字加上一个没有特定功能的“口”旁，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加形字。

2.3 嗒 “嗒”《龙龕手鏡》音塔，忘怀的样子。《龙龕手鏡·口部》：“嗒，嗒然忘怀也。”此字当是“嗒”的俗字。汉字俗体中，“𠂔”、“𠂔”两个偏旁往往混用不分。《广韵》入声盍韵吐盍切：“嗒，嗒然忘怀也。”“嗒”与“塔”属同一小韵，可见“嗒”“塔”音义皆同，应该是一字之变。“嗒”字又来源于“苔”。《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偶。”陆德明《释文》：“苔，本又作嗒，同。”“嗒”当为“苔”的后起分化字〔4〕319。

白文中“嗒”字也较为常见。但其音义显然完全不同。白文“嗒”字读音为ta<sup>44</sup>，意为“和，同”。这一音义应该来源于汉语西南官话。从其造字方法上来看，是在表示读音的“答”字加上一个没有特定功能的“口”旁，是白文加形字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类型。很显然，白文中的“嗒”并非来源于汉字俗字“嗒”，而是白文的自造字。该字不见于白文古籍文献，但在近现代白文文献中十分常见，属于晚期的白文自造字。

### 3 俗字对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的影响

汉字俗字对包括白文在内的各种汉字系文字书写符号系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里面有两个

原因：一是由于规范工作落后于文字的发展，未经规范的汉字俗字流传到各民族地区，被自然借用进入民族文字系统。二是各汉字系文字在造字时，存在一种刻意求异，以和汉文相区别的心理，在造字时，往往特意选用较为偏僻和不规范的俗字，以和通用汉字（即所谓的汉字“正字”）相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汉字俗字更符合汉字系文字书写符号系统的特点，因而被汉字系文字广为吸收和借鉴。这就造成在各汉字系文字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新奇字”来自汉字俗字的现象，有的还借用汉字俗字造字。

俗字对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3.1 直接借用俗字形 白文中的一些“白字”，实际上是直接借用汉字俗字而成的。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假借字。当然，它和汉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六书”之一的“同音假借”并不相同。前人早已认识到假借在汉字书写系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即“以不造字为造字”，实质上相当于另造一字。而白文假借汉字俗字，实际上是两种文字系统间书写符号的借用，和汉字内部的同音假借不同。加上借用时又刻意选择一些较少使用的俗字，因此很多人往往将其认为是白文中自创的“白字”，其“以不造字为造字”的特点更加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文借用汉字俗字，是白文书写符号系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书写系统上的意义不容低估〔5〕。

3.2 俗字字形结构对白文造字法的影响 与直接借用汉字俗字相比，俗字字形结构对白文造字法的影响是隐性的，但其影响比直接借用俗字要深远得多。俗字的形体结构变化，大多超出了传统的“六书”框架。而白文中很多难以用“六书”理论解释的造字法，大多都可以从汉字俗字中找到依据。

据初步归纳，汉字俗字共有13种大的构成类型：增加意符；省略意符；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节省；增繁；音近更替；变换结构；异形借用；书写变易；全体创造；合文。这些大类中又有不同的小类。其中一些主要的类型，白文中同样大量存在。如：



增加意符。主要有两类,一类意符有实际意义,表示字的意义的类别。如白文中的“背”(neɿ<sup>31</sup>或jeɿ<sup>32</sup>,意为“背”)、“弟”(the<sup>44</sup>或thi<sup>44</sup>,意为“弟”)等;一类意符没有实际意义,不表示字的意义的类别,而只是加在原字之上,以示造成新字,和原字相区别,这类俗字在汉字中也相当多,如大量的“口”旁字。这类字在白文中也代表一个重要的造字类型,可以称其为“加形字”。白文中的加形字也是以加口旁为主,也有加其它符号的。如:“上配下口”(phe<sup>55</sup> 配)、“上隔下口”(keɿ<sup>44</sup> 隔)、“左口右背”(pe<sup>44</sup> 走)、“左口右务”(vu<sup>44</sup> 厮)等。

通过结构简化或变换结构造成简化俗字。这类俗字有悠久的历史,使用十分广泛,数量也很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汉字简化工作,就是以这类汉字俗字为基础。又可分三类,一是结构简化,如上文所述的“𠂇”;二是结构省略,如“𠂇”;三是使用一些简省符号来使结构简化,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亼”、“文”等简省符号可以造成“𠂇”(佛)、“𠂇”(舉)、“𠂇”(覺)、“𠂇”(齊)等字。白文中也大量使用这一方法造成新字。如白文借用汉字的简省符号“卜”,造成“𠂇”(碗)等新字。其中有的字可能直接借自汉字俗字,有的则可能是白文自行简化的。如白文“𠂇”(现)、“𠂇”(通)、“𠂇”(墙)等。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白文的书写符号系统受到汉字俗字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造字法上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过去认为的白文“自造字”,实际上是直接借用了汉字俗字。有的白文自造字,则只是在字形上和汉字俗字偶然相同。这些不同的情形,需要结合汉字俗字的研究以及白文的书写规律进行甄别。汉字研究过去多注重金文、甲骨文等早期古文字的研究,而对汉唐以来的文字变迁关注不够。事实上,汉字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唐以来的变化也是非常巨大的。白文等和汉字系文字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始于唐代,因此,其书写符号系统的发展,与汉字自身书写符号系统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白文中汉字俗字的探讨可以看到,加强对汉字系民族文字与汉字的比较研究,十分必要。

#### [参考文献]

- [1] 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民族文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2] 杨应新.方块白文辨析[J].民族语文,1991(5):51-59.
- [3]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
- [4] 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 王锋.从书写符号系统看“古白文”的文字属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4,3(4):9-12.

(责任编辑 党红梅)